

融合思政教育的《财政学》理论和案例教学再设计

陈佳玲¹, 马 龙^{2*}

(1. 江西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2. 江西理工大学 法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如政府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满足公共需要等,与思政教育高度契合,但其教学秉承的主流思想和应用的方法均滥觞于西方经济学思想在该领域的投影。构建以行使“国家公共职能”为逻辑起点、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为政策目标、以贯彻“分配正义思想”为价值判断的《财政学》体系,能够妥善地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该学科传统教学中的西方经济理论融合起来。遵循可比性、亲历性、可分割性三个课堂案例选取标准,有助于提炼出既囊括专业知识、符合教学要求,又具备思政教育空间的主题。

关键词:《财政学》;思政教育;案例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1/G6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824(2020)05-0073-05

一、《财政学》教学融合思政教育的必要性

2019年5月21日,习近平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1]逢此时期,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我国当前面临的整体环境、切实理解我国改革调整的方针政策应是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财政学》的课程内涵和教学目标与此不谋而合。

作为一门研究国家(或政府)通过配置资源和分配收入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的学科,《财政学》所覆盖的“公共部门问题是所有经济学中最令人兴奋的一些问题。卫生、国防、教育、社会保障、福利事业和税制改革等”^[2],都属于《财政学》的研究范畴。妥适地将思政教育融入《财政学》的专业教育中,挖掘该门课程中蕴含的思政理念,不仅有利于丰富思政教育资源,扩

大隐性教育的覆盖面;也能够立足中国实践、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增强学生对“四个自信”的价值认同,解决“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鉴于《财政学》作为欧美经济研究的产物,主要是建立在西方传统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这一现状,本文一方面尝试处理该学科教学中的理论体系融合问题,即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西方传统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努力将《财政学》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融合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探索解决政策热点嫁接问题,即建立一套案例选取标准,旨在从包罗万象且层出不穷的政策热点中,选取既囊括专业知识、符合教学要求,又契合当前热点且具备思政教育空间的主体,引导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正确认识和解读热点事件以及其中蕴含的国家政策。

二、融合思政教育的《财政学》理论体系教学再设计

1. 构建以行使“国家公共职能”为逻辑起点的《财政学》体系,是融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

收稿日期:2020-07-23

基金项目:江西理工大学矿业贸易与投资研究中心研究项目(18KYB02);江西理工大学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江西理工大学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陈佳玲(1986-),女,江西兴国,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硕士。

马 龙(1985-),男,山西太原,江西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本文通信作者。

论与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可行路径。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财政学》的核心问题。西方经济学中,在承认“市场是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这一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是以市场失灵理论为前提的。而马克思主义则从国家的本质特征这一角度来论述宏观调控的理论根源。恩格斯指出:“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3]由此可见,行使公共职能是国家的必然使命。

长期以来,学界更注重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阶级性的论述,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行使公共职能只是其维护阶级统治的手段。但事实上,“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4]559-560}。不可否认,国家公共职能从属于国家政治统治职能而存在,但其从属地位并不能对抗其必然性。不仅如此,国家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总体发展趋势是社会公共职能逐步扩大并最终得到完全实现,而政治统治职能逐渐萎缩并最终归于消亡”^[5]。可以说,社会公共职能不仅与国家的产生密切相关,也是国家这一组织形式得以存续的现实需要。

因此,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并未否认“市场是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以及“市场失灵”等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前提,这为《财政学》教学中西方经济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共存奠定了逻辑基础。另一方面,其完全从另一维度,即从国家公共性这一本质特征的维度展开论述,可以丰富对“《财政学》之所以存在”这一问题的讨论视角,让一直以来在西方经济学架构下学习的经济学学子有另一种理论逻辑架构的体验。

2. 构建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为政策目标的《财政学》体系,是对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论证。

公共物品是西方《财政学》中的基础性概念。其由于不同时具备私人物品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征,从而导致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出现失灵。国家干预的具体表现就是在且仅在这些市场失灵的领域提供公共物品。然而,技术进步及其配套制度逐渐模糊了公共物品的边界,越来越多的公共物品可以通过“明晰经济资源的产权关系的办法”^[6]

实现私人提供,例如灯塔作为“经济学家认为不可能由私人提供的公共物品中最著名的例子”^[6],其私人提供的实现证明这“并不是一个十分可信的案例”^[6]。与此同时,相应公共物品的供给并不因高效市场的介入而更加充足。相反,由此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开始重新拷问市场和政府的边界问题。同样地,私人物品的供给过程也不乏政府调控的身影,其干预并不以私人物品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征发生变化为前提,干预的有效性亦不因介入竞争性领域而有所损伤。政府干预范围和方式的历史发展和各国多样化的实践证明,以公共物品的特征为出发点来论证国家干预的范围已经遭遇了现实的尴尬。

在马克思看来,公共产品所表现的消费均等性、非排他性并不是“市场失灵”产生的,而是源自于它是社会总产品中满足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同需要部分并直接由社会提供,才在具体消费过程中表现出均等性、非竞争性等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消费特殊性。因此,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重点在于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同利益角度考察公共产品的本质,它不是围绕狭义的市场需求来提供公共产品,而是围绕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同利益需要提供公共产品,以期更好地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从而有利于社会和个人发展。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马克思认为,其基本条件是整体供给,整体供给的主体主要是政府。这是因为,国家/政府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公共利益需求,是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也是人民大众的期待。同时,政府自身的特性——拥有最大的社会权力和社会资源,也决定了其供给公共产品方面的独特优势。此外,马克思并未排斥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的可能性,他曾以用水问题为例进行说明。^[7]

马克思主义基于社会共同需要的公共物品根本属性及其供给方式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一方面,其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执行公共职能是出于维护人民共同利益的需要,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优于维护阶级统治而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对整体供给基本条件的剖析和对私人供给客观现实的认可,避免了从单一技术角度机械地分析公共物品,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共物品在理论分析上的深邃性和现实对照上的开放性使其更适用于《财政学》的

课堂教学。

3. 构建以贯彻“分配正义思想”为价值判断的《财政学》体系,是对我国通过建设现代财政制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立场的深刻诠释。

如果说前述根据市场失灵和公共物品特征而确立的政府干预必要性及其范围回答的是资源配置最优化的问题,那么接下来需要解决的就是资源配置的另一个基础性问题,即公平性的问题。这是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也是西方《财政学》的基本研究范式。然而,即便西方经济学就资源配置结果的公平性或者说分配的公正性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追求效率之余另一价值准绳的地位达成了广泛共识,只要“按资分配”制度设计原则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其冠以“福利”之名的公平就只是统治阶级治标不治本的伪善。按资分配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8],体现的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

对此,马克思指出:“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正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9]264-265} 尽管马克思也承认按劳分配“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导致“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9]264-265}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9]264-265}。“在这样的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4]559-560}

应当认识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机制,是对仅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机制的纠正和超越,在我国当前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举”^[6]。而“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6],尤其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6],则更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原则的体现。

三、融合思政教育的《财政学》 课堂案例教学再设计

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财政学》理论体系进行重释和批判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我国当前面临的整体环境、切实理解我国改革调整的方针政策是本门课程的重要教学目标。在包罗万象且层出不穷的政策热点中,选取既囊括专业知识、符合教学要求,又具备思政教育空间的主题,是本文研究的另一重要内容。笔者认为,在选择《财政学》政策热点作为教学素材时,可参考遵循以下标准和方式。

1. 同一方面不同政策实践经验的可比性,即着重选取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两种及以上做法的政策案例进行研究。

如:为控制私家车上路,缓解交通拥堵问题,北京和上海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北京选择用摇号的方式向车主发放车牌;而上海选择以拍卖的方式发放牌照,拍卖所得用于补贴公共交通。

请问:北京和上海的行为分别属于哪种政府干预手段?你认为哪种更合理?为什么?

此类案例信息量充足,尤其是其中反映的多样化的社会实践往往使西方所鼓吹的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真面目暴露无遗。在多种社会实践并存且各自发挥效用的现实下,一味拒绝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和国家干预措施的有效性显然与其所谓的“民主、自由”论调背道而驰。实际上,就经济制度而言,如果“将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放在一端,而另一端是分散的资本主义经济。……所有的国家均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选择了自己的经济制度”^[10],何来高低贵贱之分?

以此为切入点,此类案例的分析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开放性思维。任何政策都是对实现目标的最佳路径的探索,但所谓的最佳路径并没有预设的标准答案,实践中的方案也往往并不唯一,各项举措的最终效果需要靠实践来检验。正如马克

思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尤其要注意避免让学生形成“唯一解”的思维方式,而应促进其在认识不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开放性地思考。

2. 政策所涉领域之于授课客体的亲历性,即着重选取契合学生年龄段社会实践经验的政策案例。

如:2018年6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分组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草案。鲜铁可委员认为,应依据各地区的人均基本生活支出水平,区分不同区域的实际消费水平来设计减除费用和专项附加扣除标准,“不要搞全国一个标准”。蔡毅委员则建议,可以授权省级人大常委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法定的幅度范围内具体确定适用标准,上报全国人大备案。

请问:你是否同意两位委员提出的“减除费用和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实行地区差别化”的提议?为什么?

在本门课程“收”、“支”、“平”、“管”体系中,“财政收入”主要涉及税收知识,包括我国现行税种、税制及其改革等。尽管分税制改革和与之相关的增值税改革是重大政策热点,但就大学生的认知水平及其工作后接触相关税收制度的可能性而言,个人所得税是更实际的选择。选择此类政策信息不仅做到了回应学生关切和期待,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提升运用所学分析具体问题的可行性和效果,更加能让学生有代入感地切身体会国家通过现代财政制度体系设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现实举措,增强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亲身体验。

诚然,本文并不否认增值税相关政策热点的重大意义及其学习的必要性。只是在增值税的框架下,其发票制度设计、中央地方分配比例、小额纳税人的认定标准及其税收优惠等问题相互交织使任何一种有关增值税政策的探讨都变得宏大而复杂,已经超出了本科阶段的学习要求。本文认为,类似性质的知识点更适合采用以基础知识教学为主、课外自主延伸学习为辅的方式。

3. 政策热点财政视角讨论维度的可分割性,即当所选取的政策热点涉及多个领域和维度时,其基于财政视角的讨论主题应能够被提炼、简化

并剥离出来。

如:西方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一度吸引了世人艳羡的目光。但过度慷慨的福利政策助长社会的懒惰和导致退休年龄一再延迟等弊端所引发的诸多问题反过来又多年持续困扰着福利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请问:你选择“高福利、晚退休”还是“低福利、早退休”?

上述福利政策属于本门课程“收”、“支”、“平”、“管”体系中“财政支出”的部分,具体而言,其讨论的是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项目、规模和配比问题。实际上,各国福利制度千差万别,福利制度本身设计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本科教学目标,更遑论其背后隐含的税制设计、政府债务管理、社保基金管理甚至消费文化、社会公平等一系列经济学和非经济学课题。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选择将其简化为福利水平与退休年龄之间的关系问题,用于课堂教学和讨论。此种处理方式不仅遵循前述可比性和亲历性原则,而且令该讨论不必局限于任何具体的政策细节,从而给予学生充分的发挥空间,不使知识储备的充盈程度成为参与政策讨论的前提条件。

就由此展开的思政教育而言,主题的可分割性利于挖掘有针对性的思政教育切入点。以上述福利政策话题为例,该主题在经济层面上反映的是社会资源配置的问题,但从大学生自身的社会选择而言,其折射出的是当代大学生对自我的要求和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是选择碌碌无为还是拼搏奋进,是选择做社会的索取者还是贡献者。诚如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1月视察南开大学时所强调的:“我们现在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阶段,我们要把学习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宏大目标结合起来,为之而奋斗。只有把小我融入大我,才会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这才是我国当代大学生应有的志气和风貌。

四、结 语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大旗之下面对企业倒闭潮的作为有限,对包括口罩在内的医疗器械单边实施出口管制而忽视经济联盟内其他国家抗疫需求的行为,充分暴露了在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政

府角色定位的短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政府充分履行了“国家公共职能”,尽力满足疫情期间的“社会公共需要”,以期实现各种资源的“分配正义”,这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财政举措在实践中的成功体现。遵循此逻辑体系,《财政学》能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寻求更为正确而深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正确传播知识,培养合格人才。

在课堂教学案例选取方面,遵循同一方面不同政策实践经验的可比性、政策所涉领域之于授课客体的亲历性和政策热点财政视角讨论维度的可分割性三个原则,选择有广泛社会实践映射、符合学生社会实践经验和财政视角主题易于提炼分割的政策热点话题,一方面为学生营造开放的讨论氛围,另一方面在真正的开放中认识到西方对社会主义偏执式的诋毁及其所谓“自由民主”的虚伪,加强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参 考 文 献]

[1] 新华社.习近平在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

区崛起工作座谈会[EB/OL].(2019-05-20)[2020-08-22]. http://www.gov.cn/xinwen/2019-05/22/content_5393815.htm.

- [2] 斯蒂格利茨,罗森加德.公共部门经济学[M].郭庆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 [3]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9.
- [4] 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周志山.马克思公共性视域中的民生问题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129.
- [6] 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 [7]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45.
- [8]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42.
- [9]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0] 理查德·W·特里西.公共部门经济学[M].薛涧坡,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5.

Redesign of Theoretical System and Case Study of *Public Finance* with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hen Jiling, Ma Long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Jiangxi 341000, China; 2. School of Law,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Jiangxi 3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bjects of *Public Finance*, such as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eeting public needs by government, are highly compatible with the subst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le the mainstream ideas and methods used in its teaching are derived from western economic thoughts in this field.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heoretical system that takes the exercise of “national public functions”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satisfies the “common needs of society” as the policy goal, and implements the “distribution justice thought” as the value judgment, might properly integrat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into western economic theory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of the subject. Following the three case selection criteria of comparability,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severability may be conducive to the extraction of topics that not only includ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meet teaching requirements, but also ha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pace.

Key Words: *Public Financ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se study

(责任编辑:胡先砚)